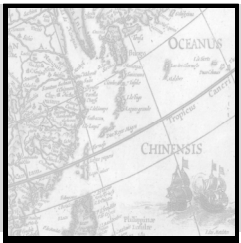

東·亞·文·化·54

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

范永聰

1. 引論—所謂「屈原意象」
2. 漢代「屈原意象」之形成
3.「屈原意象」在朝鮮半島之傳承—
兼談《東文選》所載李奎報之《屈原不宜死論》
4.《東文選》內所呈現之「屈原意象」—若干作品淺析
5. 結語

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

范永聰**

1. 引論—所謂「屈原意象」

柯慶明教授在其〈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一文中，對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及《楚辭》之「美」，有以下一段描寫：

> 屈原使《楚辭》基本上反映出一種由家居，由京城被逐，而於上下四方徬徨流蕩，痛苦追索的無處安心，無家可歸的遠別流浪情懷。這種孤臣孽子的處境，一方面導致了對於家國的更大的渴思，一方面也促成了個人自我生命的獨特性的醒覺，

---

* 拙文原題為〈麗末鮮初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乃筆者於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主辦:「新視野—東亞世界知識生產與研究方法」學術工作坊（Academic Workshop on New Approaches to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in Modern East Asia History）上發表之文章，發表日期為 2016年6月3日。 筆者有幸參與是次學術工作坊，實因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林學忠博士給予寶貴機會，筆者在此謹向林博士致以衷心謝意: 又於拙文報告期間，幸得武漢大學文學院程芸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張仲民博士及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黃海濤博士給予寶貴意見，使筆者獲益良多，筆者衷心銘謝。拙文修訂期間，復得摯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師羅婉嫻博士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羅樂然先生提供精闢見解，筆者在此一併致謝。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一級講師

以及對文明與社會之本質的反省。……它 [筆者按：《楚辭》] 透過一種高卓的文化理想, 一種廣博的歷史知識, 以一種憂心如焚的激切之情來關懷國家社會, 來抨擊時代的墮落, 人們的謬誤。它的美是一種對於高遠的理想的執著追尋之美。假如《詩經》反映的大體是常人之情的話, 《楚辭》中反映的卻是屈原的志士哲人的憂國憂世之情。因此它的美也同時是偉大人格的自我流露之美。……屈原不但成為中國第一個面目鮮明的詩人; 而且《楚辭》也開啟了以詩人自身人格為表現的偉大的詩歌傳統。1)

這段文字, 帶出明顯訊息：屈原是一位擁有高遠理想、熱愛祖國、關懷社會、憂國憂民的「志士哲人」。作為詩人, 他的作品, 促使《楚辭》展現獨樹一幟的鮮明形象，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葩。至於屈原本人, 也開啟了中國文學創作中的一大傳統—詩人的自身人格和經歷, 與其文學作品所呈現之精神面貌關係密切。這一原則, 始終為歷代文人繼承。

學者張榮翼與李松在其合著《文學理論新視野》一書中, 這樣評論屈原的「詩人形象」：

古代文化將屈原其人編碼到一個文人的忠君典型。……文學史上和一般意義的歷史上, 屈原作為一位中國古代文化的傑出代表, 他的意義可以被人從不同方面來評說和闡發, 但他作為極富正面的感召力的形象, 實際上已演變為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一個原型意象了。詩人田間(1916－1985)曾說：「呵, 屈原這位愛國詩人的名字, 也流傳至今, 還為鄉民所不忘, 它也不時打動我的心弦。」郭沫若(1892－1978)則說：「不管你是不是詩人, 是不是文學家, 凡是中國人沒有不崇拜屈原的。」屈原已成為了中國人心中一個符號, 而歷史上的屈原其人, 包括他的生平和創作等, 其間有若干分歧和有待考證的這些具體細節, 在普通民眾心目中卻並未引起注意, 他們只是尊崇屈原而已。屈原的形象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

1) 柯慶明：〈中國文學之美的價值性〉, 載柯慶明 著, 王德威 編：《中國文學的美感》(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第二版), 頁24。[全文刊載於書中 頁19－78]

分，也不妨說成了民族無意識中的原型。2)

之所以說「屈原已成為了中國人心中一個符號」，蓋因我們已然認定：「屈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愛國詩人。」關永中在其著作《神話與時間》中指出，所謂「符號」(Symbol)或「記號」(Sign)，常見於神話故事之中；或附帶於神話人物之上，皆在一定程度上傳遞著一種潛藏訊息。這種訊息與某種象徵意義關係至為密切。這種象徵意義潛藏在描繪具體事物、現象或人物的「表層義」(Literal Meaning)之下，是為「潛伏義」(Latent Meaning)。「符號」或「記號」，是解開這層「潛伏義」的鑰匙。3) 據此進一步理解，屈原雖然並非神話人物,4) 然而作為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符號或意象，他身上帶著的「潛伏義」，可謂一目了然。

---

2) 張榮翼、李松著：《文學理論新視野》(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2年)，頁195－197。順帶一提，引文中所述田間的說話，見田間著：《田間自述》，原載《新文學史料》，1984年第2期(北京：1984年2月)；郭沫若一語，出自郭沫若：〈屈原考〉，原載郭沫若著：《郭沫若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 關永中著：《神話與時間》(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頁9－11。

4) 史學界對於屈原此人存在與否，曾有爭辯。例如胡適(1891－1962)撰〈讀《楚辭》〉一文質疑屈原究竟是甚麼人，甚至認為「屈原」並非一個人物，而是一種「文化複合物」；丁迪豪(1910－1935)於〈《離騷》的時代及其他〉一文中認為《離騷》是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90）所作，不過託名屈原；日本學者岡村繁(1922－2014)在其作〈《楚辭》和屈原—關於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間的分離〉中指出，漢代(前202－220)以前的人只視屈原為忠臣，而非文學家，《楚辭》中不少作品皆非屈原所作；另一位日本學者三澤玲爾在〈屈原問題考辨〉一文中更直言屈原是「想像中的作家」。《關於上述種種懷疑，中國學者如聞一多(1899－1946)・黃中模・湯炳正(1910－1998)・陸永品・徐志嘯・趙逵夫及梅琼林等多位屈原及《楚辭》專家均曾撰文反駁，現今學界普遍認定，屈原的生卒年份及部分作品的真偽問題，雖然值得商榷，有待進一步研究；然而屈原其人於史上確實存在，而《離騷》等重要《楚辭》作品，實出於其手筆，已屬公論。拙文之撰述動機為探討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無論屈原是否真實歷史人物，建基於對其長久認識而層累積成的「文化意象」，確實影響當時韓國文人的創作意向；由是，此一問題並未影響拙文的撰述方向與內容。至於近代由「屈原否定論」所引起的學術爭論，詳見羅建新、梁奇編撰：《《楚辭》文獻研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9－22。

屈原其人, 固然於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中國人民即使對其生平欠缺深入認識, 總曾聽聞其名作如《離騷》及《思美人》等, 如何訴說他強烈的忠君愛國情感; 以及慘遭小人誣讒·懷才不遇·有志不伸, 甚至被迫君臣分離的愁緒。常森在其著作《屈原及其詩歌研究》中花了大量篇幅討論屈原詩歌的「藝術符號」, 他認為屈原作品殊豐, 然而每首詩歌都由一系列文學元素組成, 自成「系統」。例如《離騷》與《九章》中的《思美人》, 俱由玄鳥·歸鳥·雄鳩及鳳凰等組成「鳥媒系統」, 作為文學作品之描繪基礎, 這一特點說明《離騷》與《思美人》於內容上有緊密聯繫; 而此二作品均以「君臣關係」作為詩歌的討論核心, 文本內容中的種種隱喻及典故, 均為完成這項描寫目的服務。他又進而指出,「男女關係」與「美人追求」是《離騷》·《九章》及《九歌》等屈原作品中最重要的核心隱喻, 歷代文士大多認為其旨在比喻「王道理想中的君臣關係」—君臣之間的完美性格配合與絕對互信, 正是屈原心目中苦苦追求的最理想君臣關係。5)

常森的意見, 基本上承南宋(1127－1279)朱熹(1130－1200)的看法, 再綜合歷代文人對屈原及《楚辭》的評論, 附加個人見解而成。朱熹在其《《楚辭》集注》中注釋《離騷》其中一句「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時說：

兩美, 蓋以男女俱美, 比君臣俱賢也, 言兩美終雖必合。然楚國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宜以時去也。6)

這段注釋文字說明了屈原的苦況, 也把他忠君愛國卻不能一展抱負的悲傷情懷表露無遺。此點至為關鍵, 後世歷代文人之所以能在情感上與屈原產

---

5) 常森著：《屈原及其詩歌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2年), 頁143－144; 147; 152。常森於此章中致力論述屈原作品中的「藝術符號」, 見解精闢, 值得細讀。詳見該書第二章,「屈原詩歌的藝術符號」, 頁143－237。拙文只參考其對《離騷》及《九章》的「結論性意見」, 引述於此; 然書中內容對於屈原其他作品的評論, 仍有巨大參考價值。

6) 朱熹撰：《《楚辭》集注》(香港： 中華書局, 1972年), 卷一,〈《離騷經》第一 [釋文無經字] 〉, 頁19－20。

生緊密無縫的連結，全因這種源於「君臣不合」的悲傷情懷。

從「男女關係」及「美的追求」始起比喻，屈原作品內形形色色的奇幻物事，給予學者們連串猜想的空間。蘇慧霜在《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一書出指出，自漢代(前202－220)起，文人非常重視對屈原及《楚辭》之研究，下迄唐代(618－907)，關於屈原作品內種種「寓情草木」及「託意男女」—如「美人比賢君忠臣」·「香草比才德」，以及「禽鳥比情感散合」等等意象，仍是文人樂於效法的寫作方式，也是後人了解屈原內心世界的最有效途徑；而且後世文人對於這種意象的基本理解，更是歷久不變。7) 她寫道：

> 從「美人」·「香草」到「禽鳥」，意象的流變中，不變的是屈原「抒情」的意象本質，儘管後世辭賦作品，在意象經營上有著許多的變化與創新，但是，政治想望的寄託，仍是屈原意象的原型本義，顯示意象的流傳，在「變」之中仍有著「不變」的堅持。8)

蘇慧霜提及的那「不變的堅持」，想必就是屈原「政治想望的寄託」了。這「寄託」是甚麼？李健的《比興思維研究：對中國古代一種藝術思維方式的美學考察》給予答案：

> 《離騷》出現的種種意象都是隱喻、象徵式的，但其內在所經歷的磨難卻是非常真實的。屈原反覆表達自己的高潔品格，忠貞及其為小人奸佞所中傷的悲慘經歷，然其對君主(懷王)之愛卻是熾烈真誠。9)

---

7) 蘇慧霜著：《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頁152－153。

8) 蘇慧霜著：《騷體的發展與衍變：從漢到唐的觀察》，頁153。

9) 李健著：《比興思維研究：對中國古代一種藝術思維方式的美學考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19。

憑藉中國歷代文人不斷累積建構, 造就我們今天認識的屈原。透過流傳在《楚辭》裡的那些不朽作品, 屈原作為「愛國詩人」的深刻形象, 終告完成。然而, 此一「愛國詩人」形象, 或許與屈原在世時的功業無大關係, 反而源於漢代一眾文人的「刻意營造」。此一形象為後代知識分子繼承, 加以發揚, 遂致流傳至今。10)

與中國毗鄰的朝鮮半島, 自古與中國有著深刻而頻繁的文化交流, 屈原的一生事蹟, 著名作品, 以及其「人為而成」的「文化意象」, 於韓國古代知識分子間流傳, 並往往成為他們的心靈投射對象。11) 「屈原意象」偶爾出現在韓

10) 顏崑陽著〈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及傅錫壬著〈漢人對屈原事蹟的認知〉兩文, 指出有漢一代大量文人對屈原的一生功業作出評價, 當中或褒或貶, 基本上已建構了屈原的「形象」。漢代以後, 固然有不少文人繼續關注屈原的一生事蹟, 然其人對屈原之評價, 大抵離不開漢人奠下之討論框架。詳見顏崑陽:〈論漢代文人「悲士不遇」的心靈模式〉, 載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主編:《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1年), 頁209－253; 並參傅錫壬:〈漢人對屈原事蹟的認知〉, 載淡江大學中文系編:《淡江大學中文學報》, 第八期(新北市:淡江大學中文系, 2003年7月), 頁1－12.

11) 學者Lee Hai－soon於其"Korean Literature and Adjacent Literatures"一文中指出, 屈原是中國古代其中一位對韓國文人有著重大影響力及啟發性的卓越詩人; 古代韓國文人長久以來模仿屈原作品的名稱、題材、體裁、內容, 甚至文學意味等等。可惜其於文中, 對此論點只作簡介, 未見附例詳加說明。參閱Lee Hai－soon, "Korean Literature and Adjacent Literatures", in Korean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ISECO, ed. Korean Literature: Its Classical Heritage and Modern Breakthroughs (Seoul: Hollym Corporation, 2003), p. 389. [全文刊載於書中頁387－401]又於近年, 中國國內華文史學界不乏關注屈原作品及其文學意象於朝鮮半島流傳的研究成果, 例如:龔紅林:〈屈原作品韓國傳播考〉, 載《雲夢學刊》, 第31卷第3期(2010年5月), 頁46－51; 龔紅林:〈屈原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討〉, 載《雲夢學刊》, 第32卷第1期(2011年1月), 頁38－44; 琴知雅:〈歷代朝鮮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及漢文學的開展〉, 載《職大學報》, 2012年第1期(2012年1月), 頁15－19; 以及金哲:〈朝鮮詩人朴齊家與屈原的文學關係〉, 載《東疆學刊》, 第30卷第1期(2013年1月), 頁13－18等等。然而, 上述文章雖有開新風氣之功, 惟以相關課題的研究深度來作考慮, 仍有加強之空間; 加上以某一特定文本作為考察對象之研究成果, 似仍屬少數, 筆者盼望拙文能收拋磚引玉之效。

國古代文人作品之中，成為他們的文學表述工具。若把這些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知識創造」，那麼構成這種「知識」的最重要元素，非「屈原意象」莫屬。

本文旨在以成書於朝鮮(1392－1910)成宗(李娎，1457－1494；1470－1494在位)九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的《東文選》為例，淺析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藉以窺探作為一種來自中國的「人為而成」的文化意涵，「屈原意象」此一文學元素，對韓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有何重要啟示。

2. 漢代「屈原意象」之形成

漢代文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對後世文學發展造成極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在漢人筆下，屈原的形象主要呈現兩大特徵：一．他是知識分子—「士」，而且一生飽受挫折；二．他是忠臣，不過被君主放棄，屢遭貶謫，但這無損他強烈的忠君愛國情感。這兩大形象特徵，建構了明確的「屈原意象」，深深影響著後世無數文人的文學創作。12)

屈原之所以為世所識，得力於太史公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90)的記

12) 范炯主編：《歷史的祭品：悽怨的忠魂》(臺北：雲龍出版社，1993年)，頁79－80。又魯瑞菁於其〈論王逸《楚辭章句》的聖人觀〉一文中指出，王逸於《《楚辭》章句》一書中致力為屈原建立一個忠臣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屈原是忠臣，君子；更是儒家聖人的化身。魯瑞菁認為王逸此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漢(前202－8)時期知識分子對屈原的整體評價；而王逸於《《楚辭》章句》中所表達的意見，實為屈原樹立「值得後世臣子仿傚」的忠臣樣式，其影響十分巨大。參閱魯瑞菁：〈論王逸《楚辭章句》的聖人觀〉，載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主編：《臺灣學術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第一冊(臺北：伍南圖書出版公司，2007年)，頁48－49；51；62。[全文刊載於書中頁23－68]

述。 司馬遷於〈太史公自序〉中形容屈原「作辭以諷諫, 連類以爭義, 《離騷》有之。」[13] 由是為他立傳。在司馬遷眼中, 屈原不單只是文學家; 《離騷》也不純粹是文學作品。屈原可貴, 在於他擁有強烈的愛國情感, 並在失去國君信任的情況下, 仍然嘗試藉著創作文學來勸諫君主。《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

> 屈平正道直行,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 讒人間之, 可謂窮矣。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 屈平之作《離騷》, 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 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 下道齊桓, 中述湯武, 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 治亂之條貫, 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 其志絜, 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 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 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 蟬蛻於濁穢, 以浮游塵埃之外, 不獲世之滋垢, 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14]

由此可見, 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之中, 已為屈原「設計」了一個異常鮮明的形象, 此舉直令後世文人「有法可依」。事實上, 司馬遷說屈原因「怨生」而作《離騷》, 然而《離騷》不但沒有淪為洩怨之文; 其「文約辭微」, 不但反映屈原本人「志潔行廉」, 更被司馬遷褒譽為「兼具《國風》·《小雅》之長」。在司馬遷筆下, 「屈原意象」形成, 他本人更率先繼承。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己慘遭「李陵之禍」後, 已然「身毀不用」。然而歷代先賢中不乏身遭橫禍卻能發憤著述, 卒能名垂千古者, 屈原正是其一。[15] 從這個角度

---

13) 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史記》, 第十册(北京: 中華書局, 1972年),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頁3314。

14) 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史記》, 第八册(北京: 中華書局, 1972年),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頁2842。

15) 〈太史公自序〉中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 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

觀察，司馬遷能忍受奇辱，發憤著述，終成《史記》此一萬世經典之作，實出於屈原對其啟發；而司馬遷以屈原一生經歷作為自我投射對象，亦至為明顯。16)

屈原為後世文人所熟知的經歷，除了撰述《離騷》此一佳作；「不見用於君主，屢遭貶謫」亦是其中一環。由是，「失意文人」此一形象，也是構成「屈原意象」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並不斷為後世士子繼承。其中西漢(前202－8)中期著名文士嚴忌(約前188－前105)所撰《哀時命》，就是重要一例。

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東漢(25－220)文士王逸(生卒年不詳)所撰《《楚辭》章句》中，收錄嚴忌所作《哀時命》。王逸作注時云：

>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原注：忌會稽吳人，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避漢明帝諱，曰嚴；一云名忌，字夫子］。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於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原注：一云受命而生］，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原注：一云追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17)

嚴忌雖長於辭賦，然不見重於中央政府，需要「客遊於梁」，棲身梁孝王(即淮南王劉武，前184－前144)幕下。18)《哀時命》之命題，既出於「哀屈原受性

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見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十冊，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頁3300。

16) 魯迅先生(周樹人，1881－1936)在其著作《漢文學史綱要》中稱讚《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豈亦說明屈原與司馬遷兩人之間的微妙關連？詳見魯迅著：《漢文學史綱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頁59。

17) 王逸撰，洪興祖補注，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楚辭》卷第十四〉，〈《哀時命》章句第十四〉，頁158。

忠貞」, 亦何嘗不是把自己的失意之情寄託到文學作品之上？《哀時命》中的文句, 諸如：「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 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志憾恨而不逞兮, 杼中情而屬詩」·「居處愁以隱約兮, 志沈抑而不揚」, 以及「身既不容於濁世兮, 不知進退之宜當」[19] 等等, 清晰地把嚴忌與「屈原意象」之間的關聯展現出來。而《哀時命》中的「哀」字, 也把生於不同時代, 但際遇相近的「忠臣義士」連結起來—「哀」就是他們的命運; 也是這一類知識分子的共同屬性。有著共同屬性的騷人墨客,「屈原意象」總是貫穿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及至東漢, 這類對「屈原意象」有所感召的知識分子, 隨著時代推演, 在數量上有所增加。范曄(398－445)所撰《後漢書》中不乏例子, 如〈梁統列傳〉中記載東漢初期武將梁統(生卒年不詳)之子文學家梁竦(？－83)的事蹟時, 有云：

> 竦字叔敬, 少習《孟氏易》, 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 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 歷江·湖, 濟沅·湘, 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 乃作《悼騷賦》, 繫玄石而沈之。[20]

梁竦不單只因「感屈原以非辜沈身」而作《悼騷賦》, 他更「繫玄石而沈之」, 以為紀念屈原之舉。「沈石」此一舉動,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 實與「行為藝術」無異。如非受到「屈原意象」之深刻感召, 又何來如此舉動？

---

18) 有關嚴忌生平事蹟, 詳見班固撰, 顏師古注：《漢書》, 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5年), 卷六十四上,〈嚴朱吳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嚴助〉, 頁2775－2791。

19) 從文本上觀察,《哀時命》差不多每句也帶有強烈的「生不逢時, 懷才不遇」意識。其全文見王逸撰, 洪興祖補注, 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 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十四〉,《《哀時命》章句第十四〉, 頁158－163。

20) 范曄撰, 李賢等注：《後漢書》, 第伍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3年), 卷三十四,〈梁統列傳第二十四〉,〈梁竦〉, 頁1170。

另一例子, 如《後漢書》卷四十八〈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中所記應奉(生卒年不詳)之生平事蹟, 有曰：

> 及黨事起, 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 因以自傷, 著《感騷》三十篇, 數萬言。[21]

應奉的事蹟中有一點非常值得注意：他之所以「慨然以疾自退」, 是因為「黨錮之禍」起。「黨錮之禍」後, 漢室朝政敗壞, 文氣飽受摧殘, 不少文士失意官場。因朝廷腐敗及時政紊亂而決定退隱的文人, 也能從屈原的生平中找到聯繫, 從而繼承「屈原意象」, 並在作品中反映出來。這種例子, 在韓國古代歷史中, 尤其處於朝代交替之際, 顯然易見, 下文將作詳述。

司馬遷為屈原塑造了一個聖賢形象, 兩漢文人也多盡力捍衛, 加以繼承。不過, 仍有學者對屈原的事蹟與性格提出質疑之處, 當中可以賈誼(前200－前168)及班固(32－92)為表表者, 他們的意見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史記》中有〈屈原賈生列傳〉, 司馬遷安排屈原與賈誼兩人合傳, 是因為他認為兩者有共通處—「作辭以諷諫, 連類以爭義」。誠然, 兩人同有被貶經歷,[22] 賈誼對「屈原意象」固然亦有所感召, 對屈原的經歷也是深感同情—何況這也是他本人的經歷, 自然感同身受; 他在《弔屈原賦》一文中, 確實展現

---

21) 范曄撰, 李賢等注：《後漢書》, 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 1973年), 卷四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應奉〉, 頁1609。

22) 賈誼力行改革, 試圖擴張君權, 乃至獲罪於權貴, 卒被流放在外, 出任長沙王太傅一職。長沙在當時來說堪稱蠻荒之地, 遠離權力核心。此番外放, 絕對是「失意官場, 懷才不遇」。詳見司馬遷撰, 裴駰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正義：《史記》, 第八冊,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頁2492。

了這種情感,[23] 但他同時質疑屈原為何堅持為楚殉死：

> 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螾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惠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固將制於蟻螻。[24]

對於賈誼來說，既然有志難伸，就不應多加強求，反而可以考慮「遠濁世而自藏」；即令未可，仍有空間可尋—「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自尋短見？

同樣不明白何以屈原會執意尋死，班固的意見卻遠較賈誼尖銳。如果賈誼的意見屬於「質疑」；那麼班固的言論無疑是「批評」。他在〈《離騷》序〉中說：

>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

---

23) 賈誼撰《弔屈原賦》，出於感傷自身經歷與先賢屈原類同，實為公論。詳見 Constance A. Cook and John S. Major, eds. Defining Chu: Image and Reality in Ancient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58－159.

24)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八册，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頁2494－2495。

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25)

可見班固雖然不否定屈原是「高節之士」，但屈氏同時性格偏激，屬於「絜狂狷景行之士」，乃至不容於世—人有高風亮節，固然可喜；然而行事偏激，導致最後悲劇收場，這可算是自找，與人無攸。至於自司馬遷為屈原立傳起，代代文人皆稱譽屈子其文「可兼《國風》·《小雅》」，班固也不以為然。對他來說，屈原所作《離騷》，文中只是不斷「責數」懷王，滿載「怨惡」及「強非」等負面情緒，絕對違反儒家傳統用文章委曲進諫的文學宗旨。即令在文學地位上，雖然班固也認同屈原堪稱「辭賦宗」，但其作品內滿佈神怪虛無之語，亦不符合儒家思想對文學作品的基本要求。班固身處的時代，儒家學說早已定於一尊；他本人身為蘭台令史，加上自小熟讀群經，自然事事以儒學思想為出發點。班固對屈原提出這些批評，固然有過於主觀之嫌，但實在也是自然不過的事。26)

---

25) 班固：〈《離騷》序〉，載王逸撰，洪興祖補注，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臺北：世界書局，1972年），〈《楚辭》卷第一〉，〈《離騷經》章句第一〉，頁29。

26) 范曄在其《後漢書》〈班彪列傳第三十下〉最後部分附有論曰：「［班］彪·固譏［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或可視作一點補充，作為解釋班固對屈原作出一系列批評的原因。詳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第伍册，卷四十下，〈班彪列傳第三十下〉，〈班固〉，頁1386。又胡正之於〈從班固悲士論兩漢知識分子性格之轉變〉一文中指出，在司馬遷心目中，「士」之最高成就為「聞達於世」，其思想可謂上承戰國時代的「游士遺風」；而班固則較重視「遂志行道」，實為典型儒家思想對知識分子一生成就的終極追求。兩者之間的分別，說明了兩漢對「士」之本質的不同看法。關於這種觀點，詳見胡正之：〈從班固悲士論兩漢知識分子性格之轉變〉，載王初慶等編：《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嚴出版社，1995年)，頁179－200。若從這個角度出發分析，則司馬遷與班固對屈原的評價有所不同，與二人所身處的時代背景及學術環境相異，實有至為密切之關係。

撰述《《楚辭》章句》的王逸，對班固的見解不敢苟同。他認為屈原於亂世中堅持寧死不屈的態度，堪稱「人臣之義」，並強調作為忠臣，不應「明哲保身」；《離騷》之作，亦如司馬遷所稱譽那般—屈原於怨憤之中，仍能堅守忠臣之義，寓諷諫於辭賦之內，實為後世文人典範。屈原於文學上之貢獻，又豈如班固所言之區區「辭賦宗」?[27]

王逸反對班固，促使建基於司馬遷所謂「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而生也」的「屈原意象」在後世知識界及文學界中產生「兩極反應」：其一．如司馬遷、嚴忌、梁竦及應奉諸人，嘗試把自己的經歷與感受投射到屈原身上，故其作品反映強烈的「屈原意象」意識—尤其亂世之時，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其二．如賈誼及班固等，對屈原的人生結局雖感同情，但認為他憤而自盡的做法有違儒學之道。這種分歧，不單見於中國,[28] 更隨著漢字文學的東傳，遠及朝鮮半島。

3.「屈原意象」在朝鮮半島之傳承—兼談《東文選》所載李奎報之《屈原不宜死論》

關於屈原的作品如何東傳至朝鮮半島，由於缺乏詳盡文字記錄，現今只能知其梗概，當中更包含大量推想。其中一個合理猜測，屈原及部分《楚辭》作

27）王逸所撰原文篇幅甚長，筆者於此只述其文要點而已。原文詳見王逸撰，洪興祖補注，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一〉，〈《離騷經》章句第一〉，頁27－29。

28）關於中國歷代各種文獻對於屈原的功過評價問題，尤其與屈原尋死之原因及其影響等等相關者，《《楚辭》文獻研讀》一書中有扼要交代，或可作為進一步參考之資。詳見羅建新、梁奇編撰：《《楚辭》文獻研讀》，頁43－46。

品應當是伴隨司馬遷所撰《史記》及南梁(502－557)蕭統(501－531)所編《昭明文選》東傳朝鮮半島。太史公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引錄了屈原所撰《離騷》·《漁父》及《懷沙》等作品部分原文，並提及《天問》與《哀郢》；對屈原生平事蹟及其精神亦有所介紹。[29] 據韓國現存最古官修正史—高麗朝(918－1392)名臣金富軾(1075－1151)所撰《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高句麗(前37－668)小獸林王（高丘夫，？－384；371－384在位）二年(372年)於國內設立「太學」，教育子弟;[30] 按《周書》〈高麗傳〉記載，其時高句麗太學中的教材有《五經》·《三史》及《三國志》等,[31] 而《史記》即屬《三史》之一。由此可作推測，至遲在公元四世紀時，《史記》已東傳至朝鮮半島北部—時高句麗為半島上大國，統治今日漢江以北廣大領土，該國國內知識分子接觸到屈原的作品，應屬合情合理。

《舊唐書》〈高麗傳〉載：「其書有《五經》及《史記》·《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32] 可知唐代之時，《昭明文選》已東傳至高句麗，並為其國人「愛重」。《昭明文選》卷三十二及三十三選錄王逸撰《《楚辭》章句》部分內容，屈原所作《離騷》·《東皇太一》·《湘夫人》·《雲中君》·《湘君》·《山鬼》·《少司命》·《涉江》·《卜居》及《漁父》等作品盡在其中,[33] 由是高句麗國內已見屈原之

29) 詳見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八冊，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頁2481－2491。

30) 金富軾撰，趙炳舜編：《增修補註三國史記》(서울特別市：誠庵古書博物館，1986年)，卷第十八，〈高句麗本紀第六〉，〈小獸林王〉，頁299。

31)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四十九，列傳第四十一，〈異域上〉，〈高麗〉，頁885。

32) 劉昫等撰：《舊唐書》，第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百九十九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東夷〉，〈高麗〉，頁5320。

33) 江增慶編著：《中國文學史》(臺北：伍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45－47；並參琴知雅：

作, 這亦為此後韓國歷代文士領會「屈原意象」及模仿《楚辭》作品奠下重要基礎。 統一新羅時期(668－901), 《昭明文選》成為貴族子弟教育中的重要科目, 中國文學作品對韓國文學的發展由是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34]

《昭明文選》內雖然未有收錄所有《楚辭》作品, 但王逸撰《《楚辭》章句》部分內容, 早已隨《昭明文選》東傳朝鮮半島, 此乃不能否定之事實, 而其文於韓國古代文人之間造成影響, 亦屬自然之事。 及至宋代(960－1279), 朱熹撰《《楚辭》集注》問世, 成為歷來最有系統而又影響深遠之《楚辭》注本。[35] 雖然現在未有確實證據證明此注本於高麗末年東傳至朝鮮半島, 但麗末大文豪李齊賢(1287－1367)曾在其名作《櫟翁稗說後一》中云：

> 屈原有《天問》, 子厚[筆者按：柳宗元(773－819)]隨而答之曰《天對》, 俱險澁難讀。 吾家有朱晦菴 [筆者按：即朱熹] 註, 讀之, 所謂煥然冰釋, 怡然理順者也。[36]

顯然, 李齊賢在世之時, 朱熹撰《《楚辭》集注》, 已東傳至朝鮮半島。 至於其

〈歷代朝鮮士人對《楚辭》的接受及漢文學的展開〉, 載《職大學報》, 2012年第1期(2012年1月), 頁16。

34) 朴晟義著：《韓國文學背景研究》(서울特別市：예그린 出版社, 1978年), 頁552－553°

35) 羅建新·梁奇編撰《《楚辭》文獻研讀》一書中指出, 朱熹注釋《楚辭》的動機, 一方面出於對南宋(1127－1279)朝政混亂·敗壞的「孤憤」; 另一方面則本著性理學的觀點, 嘗試把《楚辭》中若干作品納入儒學思想的軌道上。 朱熹撰《《楚辭》集注》一書, 在內容上有兩大特色：一·它試圖找出《楚辭》眾多作品之間的關連, 尋求其中的完整思想意蘊; 二·它關注《楚辭》形成的時代, 嘗試了解其作品內容與其形成時代之間的密切關係。 這點至為重要, 它揭示了《楚辭》的深層思想內涵。 由於《《楚辭》集注》在內容上有上述諸般特色, 貢獻堪稱宏大, 故以後歷代均為《楚辭》研究者奉為極重要的參考文本, 影響非常深遠。 詳見羅建新˙梁奇編撰：《《楚辭》文獻研讀》, 頁191－192。

36) 李齊賢：《櫟翁稗說後一》, 載李齊賢撰, 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益齋先生文集》(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 1999年), 頁134。

東傳因由，或為麗末儒臣於中國搜購所致。李齊賢於其《櫟翁稗說前二》中記曰：

> ……白彝齋[原注：頤正][筆者按：麗末名儒白頤正(1247－1323)]從德陵[筆者按：高麗忠宣王(王謙/王璋，1275－1325；1308－1313在位]]留都下[筆者按：指元朝(1271－1368]首都大都，今北京]十年，多求程[筆者按：程頤(1033－1107]]·朱[筆者按：朱熹]性理之書以歸。[37]

《高麗史》〈白頤正傳〉記載名儒白頤正於中國大都學習程·朱理學之事，並說：「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首先師受。」[38] 由此可見，白頤正於宋代性理學東傳至朝鮮半島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39] 巧合的是，李齊賢正是白頤正的學生；而李氏在《櫟翁稗說後一》中亦明言他家藏有朱熹所撰《《楚辭》集注》一書，此書或先為白頤正於中國所得，後傳予學生李齊賢，亦當為合理之事乎？

以上所述，雖憑藉有限史料作出猜測；然史文明記，韓國古代早存《楚辭》若干作品，故可肯定的是，高麗立國以前，韓國文人對於屈原其人及《楚辭》作品，定不陌生。

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在朝鮮半島得到繼承。著名文集《東國李相國集》的作

---

37) 李齊賢：《櫟翁稗說前二》，載李齊賢撰，韓國文集編纂委員會編：《益齋先生文集》(서울特別市：景仁文化社，1999年)，頁98。

38) 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再版)，卷一百六，列傳卷第十九，〈白頤正〉，頁260°

39) 金忠烈著：《高麗儒學思想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年)，頁276。至於宋代性理學於高麗末年東傳至朝鮮半島始末，詳見范永聰著：《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9年)，頁131－137。

者—高麗名相李奎報(1168－1241)撰有《屈原不宜死論》一文, 其見解與上文提及班固對屈原的批評可謂同出一轍。由於班固對屈原的批評見於王逸撰《《楚辭》章句》之內, 而此書內容已為《昭明文選》收錄, 並已東傳朝鮮半島; 由是, 李奎報於《屈原不宜死論》內所表達的見解, 不妨視之為班固意見之傳承。李奎報在文中說：

> 古有殺身以成仁, 若比干者是已; 有殺身以成節者, 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 其惡不可不諫, 諫而被其誅, 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紂, 猶有慙德, 凡在義士, 不可忍視, 故孤竹二子, 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 恥食其粟而死, 是亦死得其所, 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 擧異於是, 死不得其所, 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明, 邪諂之害正, 自古而然, 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 爲王寵遇, 專任國政, 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爲上官大夫所譖, 見疏於王, 此固常理, 而不足以爲恨者也。原於此時, 宜度王之不寤, 滅迹遠遁, 混于常流, 庶使其王之惡, 漸久而稍滅也。原不然, 復欲見容於襄王, 反爲令尹子蘭所讒, 放逐江潭, 作湘之纍囚。至是雖欲遁去, 其可得乎？是故, 憔悴其容, 行吟澤畔, 作爲《離騷》, 多有怨曠譏刺之辭, 則是亦足以顯君之惡。而迺復投水而死, 使天下之人, 深咎其君; 乃至楚俗, 爲競渡之曲, 以慰其溺; 賈誼作投水之文, 以弔其寃, 益使王之惡, 大暴於萬世矣。湘水有盡, 此惡何滅！……若懷王則聽讒踈賢而已, 當時此事, 無國無之。原若不死, 則王之惡, 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 而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論, 迺所以雪原之寃, 而益貶其君之惡, 庶以諷後之信讒斥賢耳, 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 嗚呼！[40]

觀李奎報之文, 他並非不同情屈原的遭遇, 只是屈原撰述《離騷》, 自沉汨羅, 誠如班固所言, 是偏激舉動; 非但對楚國無益, 更只是「顯君之惡耳」。對李奎報來說, 屈原作為高級官員, 被其他大臣進讒, 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

---

40) 李奎報：《屈原不宜死論》, 載盧思愼′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 第四册(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1970年), 卷之九十九, 〈論〉, 頁18－19。

他未能選擇「滅迹遠循，混于常流」；反而撰文譏諷君主，走上自盡的不歸路。此舉雖引來後人不斷紀念憑弔，但同時大大破壞楚王的「形象」和聲譽，絕非忠臣所為。

李奎報對屈原的批評，與其本人的際遇與他身處的時代有密切關係。李奎報字春卿，號白雲，因酷愛琴、詩、酒三物，故又自號「三酷先生」。高麗明宗(王皓，1131－1202；1171－1197在位)二十年(1190)科舉登第，授政堂文學、守太尉參知政事，官職相當於丞相，故人謂「李相國」。李奎報為人雅直正道，極具才氣，經史禪佛，無一不精。尤長於文學，被譽為高麗第一人，在朝中更有「人中龍」的稱號。李奎報一直活躍於高麗朝廷，長期任職高級文官，[41] 對於屢遭貶謫的屈原，即令有感同情，也難像司馬遷般感同身受。同時，高麗自光宗(王昭，925－975；950－975在位)九年(958)五月起，仿照中國唐代制度，推行科舉選士，考試內容以中國儒家經籍及文學作品為主，科目有「詩賦頌」、「時務策」、「明經」、「醫」及「卜」等諸業。[42] 至李奎報登第時，高麗科舉已經推行超過二百年，儒家思想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共同信守及擁護的意識形態，儒學非常發達，官・私兩學發展臻於鼎盛。[43] 李奎報自小熟讀儒家經籍，思想上與同為儒生的班固自然較為接近。他對屈原的批評，也

41) 趙潤濟著，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上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109。又關於李奎報的生平事蹟，詳見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册，卷一百二，列傳卷第十伍，〈李奎報〉，頁193－194。

42) 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二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2年再版)，卷七十三，志卷第二十七，〈選舉一〉，〈科目一〉，頁494。又關於高麗一朝科舉制度之種種，李成茂教授著《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一書中有詳細論述，並附精闢見解，可作延伸參考。詳見李成茂著，張璉瑰譯：《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7－35。

43) 由於推行科舉制度，高麗國內的儒學得到極大提倡，至十一世紀中葉，官學與私學都進入鼎盛期。關於其發展概況，詳見簡江作著：《韓國歷史》(臺北：伍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頁201－202。

明顯從儒家忠君思想的角度出發, 認為屈原的行為, 令楚王背負「昏君」的惡名, 實非忠臣所為。

4.《東文選》內所呈現之「屈原意象」一若干作品淺析

上文曾經提及, 源於漢代文人刻意營造的「屈原意象」, 在後世中國知識界及文學界中產生「兩極反應」: 一為文人嘗試把自己的經歷與感受投射到屈原身上; 另一為對屈原有所譏評, 甚至否定他「愛國詩人」或「忠臣」的形象。這種情況, 於韓國古代亦有出現。例如前節提及李奎報所撰《屈原不宜死論》一文, 即可視為韓國古代文人對屈原的一點批評。

成書於朝鮮成宗九年(1478)的《東文選》, 堪稱是韓國古代文學成就的表徵。[44] 它不單只是一部文學選集, 其中不少內容更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與文學藝術成就, 足以稱道為中韓文化交流之具體見證。[45] 《東文選》所收錄的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 偶有言及屈原其人; 或足以反映「屈原意象」者, 皆為了解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屈原意象」之上佳素材。

關於《東文選》之纂集目的, 編修者之一徐居正(1420－1488)在其〈《東文選》序〉中說得明白:

> ……高麗氏統三以來, 文治漸興。光宗設科取士, 睿宗好文雅, 繼而仁′明亦尚

44) Cho Dong－il. Korean Literature in Cultural Context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eoul: Jipmoonda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pp. 22－23.

45) 陳彝秋:〈徐居正與《東文選》〉, 載《古典文學認識》, 2008年第6期(2008年6月), 頁80。

儒術。豪傑之士，彬彬輩出。……我國家列聖相承，涵養百年，人物之生於其間，磅礴精粹，作爲文章，動盪發越者，亦無讓於古。是則我東方之文，非宋、元之文，亦非漢、唐之文，而乃我國之文也。宜與歷代之文，幷行於天地間，胡可泯焉而無傳也哉？……吾東方之文，始於三國，盛於高麗，極於盛朝。46)

徐居正對高麗、朝鮮兩代文章之盛，充滿信心；尤其鮮初(盛朝)之文，更足以稱道為「東國之文」，而非從屬中國歷代文風。要彰顯此一事實，纂修一部屬於「東國」自身的文學作品結集絕對刻不容緩。事實上，《東文選》的纂修，確有保存韓國古代文學作品之大功，47) 其內容足以作為考察一代文風及文學思想的重要依據。利用如此一部富有「東國文學集大成者」意涵的文學選集來窺探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對於中韓文化交流史此一研習課題來說，可謂別具意義。

在芸芸《東文選》內所載作品當中，筆者選取了以下數種，作為考察對象：一．尹彥頤(1091－1150)撰《廣州謝上表》；二．林椿(生卒年不詳)撰《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三．權近(1352－1409)撰《《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四．鄭夢周(1342－1398)撰《思美人辭》。它們從不同角度出發，展現韓國古代文人作品如何傳承及演繹「屈原意象」此一獨特文學元素。

1）尹彥頤：《廣州謝上表》

尹彥頤，高麗仁宗(王楷/王構，1109－1146；1123－1146在位)朝登第，歷任起居郎、國子司業，曾赴經筵講論經義，後遷寶文閣直學士。仁宗幸國子

46) 徐居正：《《東文選》序〉，載盧思愼、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一冊(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頁1。

47) 李仙竹主編：《古代朝鮮文獻解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48－249。

監, 命金富軾講論《易經》, 並請尹彥頤「問難」。 尹氏精於《易經》, 席間一時忘形, 不斷詰問, 使金富軾「難於應答, 汗流被面」, 由是懷恨在心。不久, 金富軾上表彈劾尹彥頤與左司諫鄭知常結黨營私, 尹氏因而於仁宗十四年(丙辰, 1136)五月被貶至梁州出任防禦使。 及後於地方上屢遷官職, 「坐廢六年」。[48] 尹彥頤嘗撰表文, 以為辯解, 題為《廣州謝上表》, 文中有云:

> 昨於丙辰五月, 被中軍 [筆者按 : 時金富軾出任中軍一職] 彈奏, 奉勅落臣行職, 受梁州防禦使。臣卽日奔去, 越戊午年, 伏蒙聖慈, 除臣廣州牧使兵馬鈐鍇管勾學事, 禮部侍郎, 許令催赴。至庚申十二月, 朝謝並得施行, 今已拜官者, 坐廢六年。分已甘於萬死, 銜恩一旦, 勢若出於再生。仰天無言, 撫己揮涕, 中謝。竊以上之馭下, 莫不欲忠, 臣之事君, 期於見信, 然不可必, 故或相乖。周公不免於流言, 絳侯[筆者按 : 漢初周勃(? - 前169) · 周亞夫(? - 前143) 父子] 尙遭於繫急。望之[筆者按 : 蕭望之(? - 前46), 漢元帝(劉奭, 前75 - 前33; 前49 - 前33在位) 帝師] 帝之傅也, 終於飮毒; 屈原王之親也, 卒以沉江。聖賢猶或如之, 庸瑣何足筭也 ? [49]

尹彥頤於此表箋中尊稱屈原為「聖賢」, 其對屈原的評價與李奎報大相徑庭。他雖然謙虛地形容其被貶經歷是「聖賢猶或如之, 庸瑣何足筭也 ? 」但從文意中也可清楚察見, 他把自己的經歷比附屈原—《廣州謝上表》中明顯可見「屈原意象」的影響力。「貶謫」成為尹彥頤與屈原兩人之間最重要的「連結」; 有著這種不幸的類同經歷, 尹彥頤在其作品中提及屈原的事蹟, 也自然屬於一種理所當然的情感投射。

---

48) 鄭麟趾等纂 :《高麗史》, 第三册, 卷九十六, 列傳卷第九, 〈尹彥頤〉, 頁117 - 118。

49) 尹彥頤 :《廣州謝上表》, 載盧思愼 徐居正等纂集 :《東文選》, 第二册(東京 :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1970年), 卷之三十伍, 〈表箋〉, 頁107。[全文篇幅頗長, 刊於頁107 - 109; 並見於鄭麟趾等纂 :《高麗史》, 第三册, 卷九十六, 列傳卷第九, 〈尹彥頤〉, 頁118 - 120。]

2）林椿:《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

林椿, 生卒年不詳, 只知與李奎報約為同時期人, 號西河, 有《西河先生集》傳世。武臣鄭仲夫(1106－1179)亂起(「庚寅之亂」, 高麗毅宗二十四年, 1170), 矢志盡殺文臣, 林椿整家蒙難, 獨他一人逃脫。其人文名甚大, 科舉卻每每落第, 終以布衣身份辭世。據《高麗史》〈李奎報傳〉記載, 林椿與李仁老(1152－1220)・吳世才・趙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等人組織「竹林高會」, 閒時遊於山野木林, 醉酒賦詩, 當中林椿與李仁老實為骨幹人物; 他們二人文名之大, 被認為於高麗中期首屈一指。50)

林椿一生致力功名, 卻最終布衣辭世, 如此生平, 與「屈原意象」當然十分契合。在其《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一文中, 他用一句說話來形容何謂上佳文章, 他說：

> 博如莊周, 哀如屈原, 明如賈誼。51)

他說「哀如屈原」—屈原的名作《離騷》, 不就是「哀」這種情緒的代表作嗎？不受君主重用, 雖然心繫國家, 然眼見國家將亡也無能為力, 最終還落得「自沉汨羅」的下場, 這無疑是一種「哀」; 深刻展現上文提及柯慶明教授所指屈原作為「孤臣孽子」的悲傷心情。林椿認為屈原的文章中能散發一種「哀」的感

---

50) 趙潤濟著, 張璉瑰譯：《韓國文學史》, 上册, 頁108－109; 並參鄭麟趾等纂：《高麗史》, 第三册, 卷一百二, 列傳卷第十伍, 〈李奎報〉, 頁193。又「竹林高會」一名, 源於對中國古代「竹林七賢」之思慕, 蓋當時朝政敗壞, 武臣當權, 不少文人厭棄政治, 寄情山水閒樂及文學創作。詳見朴晟義著：《韓國文學背景研究》, 頁43; 並參李家源著, 趙季′劉暢譯：《韓國漢文學史》(南京：鳳凰出版社, 2012年), 頁138。

51) 林椿：《上按部學士啟代人行》, 載盧思慎′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 第二册, 卷之四十六, 〈啟〉, 頁269－270。

覺, 並感召後代萬千文人, 絕對是最成功的文學作品。陳怡良教授在《屈騷審美與修辭》一書中指出, 屈原多數作品中都散發濃厚的「悲劇之美」, 《離騷》固然就是出於「怨念」之作, 當中諸多文句如「傷靈修之數化」·「哀民生之多艱」·「哀眾芳之無穢」, 以及「哀高丘之無女」等等, 明顯為「哀怨」而撰。[52] 從這個角度作出評析, 林椿說「哀如屈原」, 不單透露了他本人的文學觀念, 更證明他能精準掌握屈原作品的本旨; 他與屈原之間, 有著緊密連結。

著名韓國文學史家李岩教授近著《朝鮮文學的文化觀照》一書, 書中謂林椿一生都沉淪於理想與現實之間, 縱有驚世文才, 最終為科舉制度所害。[53] 林椿的人生何嘗不是一種「哀」的現實寫照？他與屈原之間的契合, 可說是天衣無縫,「屈原意象」在林椿身上展現巨大效果。

3) 權近:《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

朝鮮初年著名學者權近, 撰有《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一文, 除刊載於《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中, 也收錄於《東文選》內。其文中有言曰：

> 文章, 隨世道升降, 是盖關乎氣運之盛衰, 不得不與之相須。然往往傑出之才, 有不隨世而俱靡, 掩前光而獨步者矣。昔屈原之於楚, 淵明之於晉, 雖當國祚衰替之季, 而其文章愈益振發, 曄然有光, 且其節義凜凜, 直與秋色爭高, 足以起萬世臣子之敬服, 其有功於人倫世教爲甚大, 獨其文章可尙乎哉？星山陶隱李先生, 生於高麗之季, 天資英邁, 學問精博, 本之以濂洛性理之說, 經史子集百氏之書, 靡不貫穿, 所造旣深, 所見益高, 卓然立乎正大之域。至於浮屠老莊之言, 亦莫不硏究其是否。敷爲文辭, 高古雅潔, 卓偉精緻, 以至古律倂儷, 皆臻其妙, 森然有法

52) 陳怡良著:《屈騷審美與修辭》(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8年), 頁53－54。

53) 詳見李岩著:《朝鮮文學的文化觀照》(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5年), 頁111－123。

度。54)

權近此文, 固然旨在稱讚麗末大文豪之一李崇仁(1347－1392)的驚世文才; 但他對屈原的高度評價, 也值得多加注意, 足以視為韓國古代文人對於屈原的正面認識。權近認為屈原不單只文章出眾, 而且人格「節義凜凜」, 甚至可與「秋色爭高」, 為「萬世臣子敬服」, 更「有功於人倫世教」。這種觀點, 可說是直接繼承上文所述' 中國歷代對屈原的主流評價。李崇仁能與屈原相提並論, 權近對其稱譽確實甚高。

權近還在本文中提出另一個重點：文風盛衰雖然與世道有一定關係, 但傑出人才往往能夠打破這種定律, 亂世也可能是文風大盛之時—屈原與陶淵明(約365－427)的文學成就, 正是最佳例子。韓國方面, 亂世之中, 也往往能開創出文壇盛世。麗末鮮初幾十年間, 傑出文人輩出, 堪稱韓國文學史及思想史上一大黃金時期。55) 此一觀點, 可從《東文選》纂集一事得到引證。

上述三種收錄於《東文選》內的韓國古代文人作品, 固然足以反映「屈原意象」對韓國古代文學發展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然論及於此方面之最具代表性作品, 則非麗末巨儒鄭夢周所撰《思美人辭》莫屬。

4) 鄭夢周:《思美人辭》

鄭夢周, 字可達, 號圃隱, 謚號文忠。高麗末期著名性理學家, 有「東方理

54) 權近：《《陶隱李先生崇仁文集》序〉, 載盧思愼' 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 第三册(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1970年), 卷之九十一, 〈序〉, 頁396。

55) 蔡茂松著：《韓國近世思想文化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5年), 頁2－3。

學之祖」的美譽。他活躍政壇之時，適逢李成桂(後來之朝鮮太祖，1335－1408；1392－1398在位)勢力崛起。圃隱作為高麗忠臣，寧死不願歸順李成桂勢力，並決心與之抗衡到底，最終被李成桂五子李芳遠(後來之朝鮮太宗，1367－1422；1401－1418在位)暗殺而死，卒年五十有六。其為高麗守節而終，被後世文人奉為韓國歷史上其中一位「忠臣」代表人物；而其對於韓國古代性理學發展的貢獻，更為後世儒者稱道。56)

《思美人辭》的創作，從作品命題、體裁，以至內容各方面都明顯模仿屈原的《思美人》，其全文為：

思美人兮如玉，隔蒼海兮共明月。
顧茫茫兮九州，豺狼當道兮龍野戰。
紲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讌。
進以禮兮退以義，搢紳笏兮戴華簪。
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何爲兮江之南。57)

本辭在篇幅上，固然遠遠不及屈原之《思美人》；在體裁上，結構較為隨意，亦不及屈原之嚴整；「兮」字之應用，固為學習《楚辭》書寫特色而作，然亦非本辭之最大特色。

鄭夢周所撰《思美人辭》的最大特點，是它與屈原所撰《思美人》在意象上的緊密傳承。「美人意象」是這兩首作品的共通點，也是見證鄭夢周如何把自己的經歷及心志投射到屈原身上的最重要證據。屈原於《思美人》中，致力表

56) 有關鄭夢周之生平，詳見鄭麟趾等纂：《高麗史》，第三册，卷一百十七，列傳卷第三十，〈鄭夢周〉，頁442－453。

57) 鄭夢周：《思美人辭》，載盧思愼、徐居正等纂集：《東文選》，第一册，卷之一，〈辭〉，頁122。

達的仍是強烈的愛國及忠君思想，他所思的「美人」，固然就是楚王;[58] 然而他同時抱怨國君貪圖安逸。他雖然抱有遠大理想，但亦明白現實與自己的理想之間有很遠的距離。由是，他為了實現理想，已做好為國殉節的準備。[59]

鄭夢周的《思美人辭》，在創作思路上與屈原之《思美人》非常相近。首句「思美人兮如玉，隔蒼海兮共明月」明顯是表達思君之情；同時也可解作為對政治清明的期盼，蓋因之後數句，都表達了鄭夢周心中的理想世界，如「進以禮兮退以義」，就是明證。第二句「顧茫茫兮九州，豺狼當道兮龍野戰」可說是全辭精髓所在。鄭夢周對於當時麗季政局之擔憂，以及其愛國熱情，於這句中表露無遺。所謂「龍野戰」，出自《周易》〈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寓意政局紛亂，外患頻仍;[60] 這是高麗晚期國勢的真實反映—國內有野心勃勃的新興勢力李成桂集團崛興，造成黨派傾軋，王權旁落；國外外患頻仍，既有來自日本的倭寇，而新興的明朝(1368－1644)對高麗來說，是否重大外患仍是未知之數。[61] 第三句提及「紲余馬兮扶桑，悵何時兮與遊讌」，意指鄭夢周出使日本之經歷。由於麗末倭寇嚴重，鄭夢周曾作為使節出使日本，請求日本政府出兵共抗倭寇。[62] 從此文句看來，即使鄭氏因身負

---

58) 王逸認為屈原所指「美人」就是楚懷王，舊注多依此說。詳見王逸撰，洪興祖補注，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四〉，〈《九章》章句第四〉，〈思美人〉，頁87。

59) 有關屈原撰《思美人》之寓意，詳見馬茂元主編：《楚辭注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13－314。又王逸注文曰：「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然反觀初志，不可變易，益自修飭，死而後已也。」見王逸撰，洪興祖補注，陳直拾遺：《《楚辭》章句補注》，收入楊家駱主編：《《楚辭》注八種》，〈《楚辭》卷第四〉，〈《九章》章句第四〉，〈思美人〉，頁87。

60) 陳應鸞著：《中國古代文論與文獻探微》(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342－343。

61) 有關麗季之內外國勢與時局，詳見李丙燾著，許宇成譯：《韓國史大觀》(臺北：正中書局，1991年)，頁247－256；並參簡江作著：《韓國歷史》，頁230－236。

62) 有關鄭夢周使日始末，詳見范永聰著：《事大與保國—元明之際的中韓關係》，頁148－149。

要職而遊於海外, 仍難忘祖國及國君。

要之, 從鄭夢周的《思美人辭》與屈原的《思美人》上, 都能清楚看到一個共通點—強烈的忠君愛國情緒, 但卻伴隨極大的無力感。兩辭中的「美人意象」訴說忠臣對君主的忠心和強烈情感; 然而生於亂世卻讓兩位文人感到無力回天。縱然已經做好以身報國的心理準備, 還是沒有足夠把握扭轉局面。屈原生於戰國時代; 鄭夢周生於麗末鮮初, 兩個亂世, 一個在中國; 一個在韓國, 在時間上相差接近一千七百年, 然而出於同樣的個人情操與志向, 竟讓鄭夢周找到投放個人情感的空間, 因而創造出旨在連繫屈原所作《思美人》的《思美人辭》。自司馬遷起經歷長時間層累積成的「屈原意象」, 其強大影響力竟然可以跨越時空, 把兩位生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人緊密連結起來。

5. 結語

《東文選》內收錄′帶有明顯「屈原意象」的作品, 不算太多, 但鄭夢周所撰《思美人辭》卻至為重要。韓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屈原意象」描寫, 絕非突然出現; 一篇《思美人辭》, 代表了長久以來一種來自中國的, 由中國歷代文學家「人為而成」的文化意涵—「屈原意象」此一獨特文學元素, 如何被韓國古代文人接受, 並幫助他們在創作文學作品時完成「個人形象投射」的過程。[63] 「時代」在這個「投射」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屈原與鄭夢周同樣生

63) 金烈圭教授於其名作《韓國文學史—그 形象과 解釋》中指出, 於個別層面有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或會被後世視為「文化英雄」, 並往往成為後代文人作品中的「投射對象」; 他以此現象解釋韓國古代部分文學作品的形成過程, 並視之為「文學創作之重要素材」。金教授的觀點, 或可作為筆者此處論述之延伸參考, 特錄於此。關於「文化英雄」論點之種種, 詳見金烈圭著: 《韓國文學史—그 形象과 解釋》(서울特別市: 探求堂, 1983年), 頁363 - 384。

於亂世，亂世賦予的「哀愁」和「無力感」等等「時代特徵」，讓創作中的投射過程更為流暢，兩者之間的契合也更形完美。

若從知識生產的角度出發，「屈原意象」東傳朝鮮半島，其影響也是極為深遠。作為一種文化意涵或概念，「屈原意象」成為極受朝鮮王朝時代一眾文人歡迎的創作意涵。朝鮮時代著名文人如金時習(1435－1493)·李睟光(1563－1628)·李瀷(1681－1763)及朴齊家(1750－1815)等等，於創作文學作品時，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屈原意象」和《楚辭》作品特色的啟發或影響;[64] 屈原作為一位「憂國戀主」的「愛國詩人」，其「懷才不遇」的個人事蹟也深深感召著深受性理學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古代一眾文人，由是大量模仿《楚辭》體裁的文學作品不斷出現。[65] 這牽涉到中韓兩國長久以來在文學交流與生產上的緊密聯繫，從學術角度來看，當中尚有甚大研究空間，值得繼續深入研討。

64) 詳見龔紅林：〈屈原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討〉，載《雲夢學刊》，第32卷 第1期(2011年1月)，頁38－44。

65) 朴晟義著：《韓國文學背景研究》，頁553－554；556。

中文摘要

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以《東文選》為例

范永聰

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其人，於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中國人民即使對其生平欠缺深入認識，總曾聽聞其名作如《離騷》及《思美人》等，如何訴說他強烈的忠君愛國情感；以及慘遭小人誣讒、懷才不遇，有志不伸的愁緒。然而，屈原作為「愛國詩人」此一形象，或許與其在世時的功業無大關係，反而源於漢代(前202－220)一眾文人的「刻意營造」。此一形象為後代知識分子繼承，加以傳揚，遂致流傳至今。

與中國毗鄰的朝鮮半島，自古便與中國有著深刻而頻繁的文化交流；屈原的一生事跡·著名作品，以及其「人為而成」的「文化意象」，於韓國古代知識分子間流傳，並往往成為他們的心靈投射對象——「屈原意象」偶爾出現在韓國文人作品之中，成為他們的文學表述工具。若把這些文學作品視為一種「知識創造」，那麼構成這種「知識」的最重要元素，非「屈原意象」莫屬。

本文旨在以成書於朝鮮(1392－1910)成宗(李娎，1457－1494；1470－1494在位)九年(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的《東文選》為例，淺析韓國古代文人作品中的「屈原意象」，藉以察見作為一種來自中國的·「人為而成」的文化意涵，「屈原意象」此一文學元素，對韓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有何重要啟示。

關鍵詞： 屈原, 屈原意象, 文化意象, 文學意象,《東文選》, 韓國文學, 中韓文學交流